

印度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印度〕S. R. 乔杜里

印度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联系以及印度共产党在国外的建立，经历了一段漫长而令人困惑的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一些富有斗争精神的民族主义者已认识到不时发生的恐怖主义既天真又无用，感到只有依靠外国的援助才能产生有组织的民族革命运动并取得国家的独立。这一令人向往的前景召唤了一代勇敢的青年人去进行革命的冒险。他们大部分作为革命民族主义的密使离开印度，开始寻求武器和金钱，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外国奴役下解放出来。

对进行独立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和金钱的寻求，在欧战爆发前的一些年头就已开始。1908年阿利波尔炸弹事件以后，一批革命者离开印度，在德国和美国找到了避难之处。这些密使的首领有H·达雅尔、V·札多巴塔雅、巴尔加都拉、A·穆克赫尔吉、S·卡尔、B·杜达以及其他一些为了寻求外国政府援助的人。他们游遍了西方世界。但是，除了在世界各地组织起革命团体以外，他们的使命却未能全部完成，因为这一小部分年青人虽然无畏而忠诚，却不可能使外国政府相信他们能够真正推翻大英帝国。(1)

当1914年大战爆发时，为完成他们的革命使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们认为，使德国站在他们一边并给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以致命打击的时机已经到来。欧洲黑暗势力的增长证明了他们所期望的印度暴风雨即将来临。

柏林革命者*认为，由于战争所创造的有利条件给他们带来了非常成功的捷径，因而迅速地发表了一本要求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最后决战中同德国合作的小册子。他们的请求没有被拒绝，革命者立即受邀协商。其间，加尼福尼亚起义党最杰出的成员，H·达雅尔，从瑞士来到柏林并被邀请负责组织著名的柏林印度独立委员会(2)。同革命党会谈后，德国革命党最后决定赞助印度武装起义。它同意把给印度的金钱作为国家的贷款，在印度独立后还清；德国政府将通过它在国外的外交使馆提供武器，鼓励土耳其同德国合作，以便使印度的穆斯林能够拿起武器对付英国(3)。

德国的保证激励了印度国内外的革命者从事新的强烈的狂热活动。许多国外的学生革命者，由于独立委员会的号召，开始回国帮助把德国武器和金钱私运到印度。在通过波斯的归国途中，凯达南茨、巴·辛哈和其他几个人被英国特务逮捕并牺牲了他们的生命。1914年9月把从美国获得武器的任务交给了H·古普塔和C·查克拉瓦蒂博士。他们购买了八千零八十支斯普林菲尔牌步枪，两千四百支马枪，四百万发子弹及其他各种武器(4)。巴尔加都拉会见了被德国俘虏的印度士兵并鼓励他们拿起武器对付英国人。在

* 指逃到柏林去的印度革命者——译者

马尔尼(Marne)战斗以后,当福煦将军粉碎了德国要给予法国以致命打击的计划的时侯,法国越来越倾向于帮助印度革命者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1915年4月10日,R·M·普拉达普(5)、与巴尔加都拉和G·V·科尔斯一起根据“征服印度的使命”去到阿富汗。1915年12月1日,在这里建立了印度临时政府,普拉达普为总统,班卡都拉为总理,欧皮尔都拉赫为内政部长。同时,他们在喀布尔释放了从印度来到阿富汗而被捕的印度人。他们的首领是M·阿里,他是临时政府的秘书,后来积极参加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

东方的印度与德国的阴谋中心是距离印度最近的中立国爪哇。当运送武器和金钱从德国到印度的一切道路完全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决定让德国人把武器转交给爪哇的印度革命者。于是他们同起义党领导人一起在美国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以使用“小牛号”海轮运装大批武器。护送贵重货物的五个印度人乘“安妮·拉逊”号离开圣地亚哥,打算在下加利福尼亚海岸同“小牛号”相会。但是“安妮,拉逊号”没能同“小牛号”相会,因为当前者未按约定时间到达的时候,后者则因不敢逗留而开走了(6)。

其间,德国答应供给武器和金钱的新闻在印度“像野火一样传开了”,因而使许多人相信革命党“处在转折关头”。取得民族独立的迫切性“使得几个密秘革命组织调解了它们之间的积怨并密秘召开会议“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建立了参谋部,以J·穆克赫尔吉为总司令。”最初活动经费的筹集任务分派给了M·N·罗易,他于1914年末前往爪哇。他在不到两个月内“带回来了一些不多的金钱。至于‘金羊毛’*般的军火则已成了泡影。军火没有到达,因为如后来揭露的那样,全部的计划是一个十足的骗局”(7)。

然而,他们的“青年人的热诚、天真的乐观主义、特别是对德国的这种解放使命的信心”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压下去的。他们决心再做一次尝试,制定了新的计划;罗易在1915年初第二次离开印度去寻求“金羊毛”,下定了若找不到那批贵重货物就不回国的决心。他傻乎乎地认为,那批宝贵货物正在太平洋某处漂浮。但事实上,他直到十六年以后才回来(8)。当他回来时,他带回来的是各种不同的武器。G·D·巴里克说:“他带回的是理想和思想,是对自由主义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动员印度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将唤醒他们反对本国的剥削者。他的思想已超脱了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天真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他开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方面的新世界,使他坚信,如果自由要对他的千百万同胞真有意义,它就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范围”。(9)

M·N·罗易的原名叫纳伦德拉·纳特·帕塔查尔亚。他于1889年2月6日出生在孟加拉24—帕尔加纳斯地区的阿尔巴黎阿村的一个僧侣家庭(10)。据罗易自己讲,他的父亲“教了一辈子梵文,教的是那些相当秘书或做律师的人”(11)。在他十多岁作学生时,就参加了孟加拉的恐怖主义运动,而且由于他的献身和勇敢立即得到荣誉。他在本村学校受到早期教育,后来进入了由奥罗宾多戈斯创办的国立大学读书。但是学院的学习对他吸引力不大。在学校中,V·D·萨瓦卡尔的革命活动对他影响很大。像许多其他性情好动和勇敢的青年人一样,他参加了孟加拉两个革命组织之一的“新时代”小组。当时正是分割孟加拉的时候,而民族主义领导人则采取不买英货和政治抵制的方法去改正这一痛

* “金羊毛”源于希腊神话,指历尽千辛万苦寻找的宝物——译者

苦的过错。但是，罗易对祈求和请愿策略不感兴趣。当时激发他浪漫的意向的是武装斗争的策略。(12)

正是罗易坚强的决心和勇敢使他自动选择前往雅加达的使命。他到达这里时用的是假名C·马丁。以后发生的事情，A·K·辛底有如下的记载：“马丁由法国的领导介绍给特奥多尔·黑尔夫里希，黑尔夫里希说武器弹药的货船在开往卡拉奇的路上，援助在革命中的印度。马丁当时极力要求船队应转驶孟加拉。这一要求在请示了驻上海的德国总领事后终于获准。马丁随即返回，安排在松达班斯河畔的赖曼加尔接收名叫“小牛号”的轮船装载的货物。据说轮船装有三万支步枪配有四百万发子弹，还有二十万卢比。与此同时，马丁又发电报给加尔各答的哈里父子公司（这是一个著名的革命家所开办的虚设商号），电报写道：‘生意顺利’。黑尔夫里希在6月到8月之间从巴达维雅向加尔各答的哈里父子公司共汇款四万三千卢比，革命者领到其中的三万三千卢比后，印度当局就发现了这件事情。马丁在6月中旬回到印度，同谋者J·穆克赫尔吉、J·G·穆克赫尔吉、N·巴塔查尔吉、（马丁）、B·查特吉和A·戈什正着手计划接受“小牛号”货物并加以充分利用。他们决定分别把武器分送到三个地方：（1）哈提亚，供巴里萨尔党人所领导的在东孟加拉各区使用；（2）加尔各答；（3）巴拉索尔”。(13)

但是，几天以后，警察成功地查出了这个阴谋，逮捕了许多革命者，加上“小牛号”没有带武器到达，因此，不得不以新的努力去获得武器。根据这一使命，罗易再次离开印度。这次“小牛号”在这里了，但却没有什么武器。据罗易说，全部计划失败了，“因为德国人不愿冒这样大的风险”(14)。“心情很不愉快，但仍充满着希望”(15)。罗易决定不空手回国，而是继续寻找武器。他从爪哇旅行经过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菲律宾、日本、朝鲜和中国，直到1916年夏在旧金山登陆。在这次危险使命期间，他装扮成一个印度神学学生马丁神父。罗易写道：“一个用一本圣经和一表链挂着的金黄十字架恰当地装扮成从本地治里来的要到巴黎去进修神学的新教士，渡过了太平洋。”(16)

他到达旧金山后不几天，美国报纸登出大幅标题：“神秘的外国人到达美国——著名的婆罗门革命者或者危险的德国间谍”。罗易立即接受这个警告，他从旅社逃走投奔到附近小镇帕洛阿尔托，即斯坦福大学所在地。在这里他受到他朋友J·G·穆克赫尔吉的弟弟，D·G·穆克赫尔吉的接待。他忠告他“放弃过去，重作新人。因此，在当天晚上，M·N·罗易就在斯坦福大学校园中诞生了”。(17)

在斯坦福，罗易遇到了青年毕业生伊夫林，并且爱上了她。当罗易在西海滨两个月以后，他“横渡大陆”“在纽约城庆祝他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再生”(18)。伊夫林和他一起去了。在纽约，他同杰出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最著名的L·拉杰帕特·雷建立了联系，并开始为去德国参加柏林独立委员会做准备工作。罗易还认识了同情印度独立的著名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时期，罗易开始经常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去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从中发现新的含意。(19)

罗易在专心致力于饱尝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为他到德国的旅行进行着准备。据C·查克拉瓦蒂博士(纽约主要的印度革命者之一)说，正当德国货船“德意志号”的船长商量把罗易带往德国时，罗易却由于伊夫林父亲向纽约警察告发而被捕。但伊夫林不顾她父

亲的反对，在监狱中和罗易结了婚，两人被释放了出来。”(20)

其间，由于“鲁西塔尼亚号”的被击沉*，战争进入到决定性的局面，美国已不可能保持中立。这使得在美国的印度革命者为难。只要美国在一次大战中保持中立，到这里争取同情、支持他们事业的印度人就能进行反英宣传并得到来自美国公众各方面的很多鼓励。但是，这些流亡者的多数，没有把寻求支持者和同盟者区分开来，结果是把反英宣传同德国的宣传混在一起，被认为是侵犯美国中立。当美国放弃中立时，反德的歇斯底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反英宣传被指责为亲德。因此，他们不仅丧失美国的同情而且遭到逮捕，被当作德国的特务受到审问(21)。罗易逃往墨西哥才免于监禁。

虽然罗易“在墨西哥一个人也不认识”，但他“没有感到无用”，因为“周围有一些事情”(22)。罗易自己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刚刚取得政权，革命在大西洋的此岸引起了微弱的共鸣。所有的左翼社会主义者都得意洋洋生活在一种充满着美好前景的气氛之中。他们全都是自封的共产主义者。我被这一令人惊奇的气氛所感染。就我的情况来说，这并不是在我身上的革命温度升高了几度。而是在我的政治演进过程中的突变：从顽固的民族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突变。由于新转变的狂热，改良主义被革除教门了”(23)。

罗易在墨西哥同一些美国激进的成员建立了联系，他们中许多人在战争期间，为了逃避兵役而到墨西哥。如L·A·E·盖尔（“此人独具一格——新思想教会的福音传教士”）(24)、C·菲利普什（“由于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组织和平示威，他获得了一些声望”）(25)、欧文·格兰威治（继著名的迈克尔·高尔德的小说家）、亨利·格林坦坎普（著名画家和漫画家）、莫里斯·贝克（诗人和漫画家）和记者卡尔·比尔斯。罗易同这些被称为是“逃兵役的人”一起，开始资助那些对美国不满的墨西哥人办的墨西哥刊物。他在这些活动中，受到墨西哥政府的支持，并不奇怪。

在这一时期，罗易几乎失去了同印度的联系。自罗易离开中国以来，他实际上断绝了同印度的一切联系。虽然他在美国大概和印度人取得了联系，但他感到这种联系既无效果也不愉快。到墨西哥以后，他完全脱离了与印度人的联系，对印度国内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但他也很不关心，因为他开始认识到他早年眼光短浅。现在他选择了按革命的新思想从事活动的广阔天地，而且这些经历对他来说是令人喜悦的(26)。罗易因此感到，他现在实现他两年半前离开印度所负使命的最后尝试已经失败，这就明确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的那一章。他确信他在最近的将来不能为印度解放做出什么贡献了，便决心使自己专心致志地从事新领域的革命活动，这种活动“即使不能马上成功也有令人满意的希望(27)”。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罗易讲述了关于印度神学社会的课程。这些讲授后来用西班牙文印成了书，取名为《印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正是罗易第一个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印度历史——“一种尚未完全觉悟的新信徒的一次尝试。”(28)。在该书中，他承认宗教的思想方式曾统治过印度古代文化，但他着重加调下列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居住在印度的也有凡人，他们当然首先关心的是他们的肉体生存所需要的东西。由此前提出发，罗易说古代印度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式，不可能与其他文明古国有本质的区别。他

* “鲁西塔尼亚号”，英国轮船，1915年5月7日被法国潜艇击沉——译者

也说明了关于雅利安人的传说,认为有更有力的论据证明印度人是达罗毗荼人的后裔。在印度河流域文明遗迹发现的前几年,他就提出过如下看法,古代印度文明是前雅利安文化。但是印度河流域文化是达罗毗荼文化还是苏美尔文化,罗易认为是前雅利安文化,而且没想到,在中亚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到达印度西北部之前,印度的其他地区就已不是渺无人烟的荒野(29)。罗易认为,关于古代印度的文字和教育,在印度河君主下面,印度人民几乎不知道文盲这种现象。(30)

1918年末,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洋洲那边不断传来,欧洲革命的怒涛达到了墨西哥的穷乡僻壤。墨西哥的左翼知识分子受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鼓舞,开始着手建立民族社会党,罗易成为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他不只资助社会党人的报纸《社会主义者》,而且还同他夫人一起多次主持墨西哥社会党会议。

1919年9月,墨西哥社会党人开会时,罗易拜会了F·格鲁曾伯格,即后来著名的米哈依尔·鲍罗廷,他是作为新成立的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来到新大陆的(31)。因而使罗易一开始就不仅同“后来由于在中国的活动而成了一个有名的人物”交上了朋友,而且也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上了朋友(32)。自从他们会见以来,直到罗易1929年离开俄国为止,鲍罗廷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虽然他们在政治上经常进行很激烈的争论,如最后在中国发生的那样。据罗易说,这种争论双方是无偏见的人情交往,而且彼此互相学习。由于鲍罗廷把复杂的黑格尔辩证法传授给他,并给他讲授欧洲文化历史,所以,罗易对印度特殊精神的残余观念,逐渐消失了。(33)

鲍罗廷访问墨西哥的目的是探索性的。他到这里宣布了第三国际的成立,并帮助墨西哥社会主义者建立除俄国之外的第一个共产党(34)。但是,他的使命没能完成,因为墨西哥总统卡朗沙没有批准。据说,罗易把鲍罗廷介绍给了卡朗沙,他因此为布尔什维克所感动,他不仅请鲍罗廷转达他对俄国新政权领导人表示友好的祝愿,而且还让墨西哥外交部给他提供方便,让他同莫斯科取得联系(35)。几天以后,鲍罗廷决定回到欧洲并要罗易和他同去,因为他告诉罗易说,列宁希望他到俄国去(36)。罗易接受了这一建议,于1919年1月初同伊夫林一起在韦腊克鲁斯乘西班牙大西洋轮船阿方索十三世号,带着墨西哥外交官护照,以罗伯轩·阿莱尼·比利亚·加西亚先生和夫人的名字离开墨西哥路经柏林去莫斯科(37)。罗易离开了使他获得再生的土地,他虽然怀有新的信仰,但在理智上却是自由自在的人。他不相信没有经济解放和社会正义为内容的政治自由。他同样认识到,理智上的自由——摆脱一切传统和权威束缚的自由——是争取社会解放的任何有效斗争的条件。他已失去他原来离开印度所负使命的信念。虽然他相信武装起义的必要性,但他懂得从理智上理解革命思想更为重要。他怀着宣传革命思想比搞武器更为重要的新信念,开始走上周游世界返回印度的道路。(38)根据罗易的新信念,虽然他相信革命将必然发生,但认为在完成革命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是并非个人。它们的发生是新建立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因此,这些力量的成熟、觉悟乃是革命的客观条件。在基本条件之前,不能进行武装起义。因此,必须把与现存法律相对抗的社会力量从政治上动员起来并组成革命的军队。只有那时,才能出现把准备为解放而斗争的战士武装起来的问题。罗易现在觉得:“我们的旧的革命思想本末倒置。它认为武器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一旦出现了获得它们的机会,我们便相信革命已处在紧要关头。我们没有好好考虑一下,

使用武器的人如何征集的问题。地下党的党员极少，不足以组成革命军队。”(39)这新的革命思想和它将如何发生的设想使罗易感到：他“匆匆忙忙”回到印度毫无意义。他从可得到的不多的新闻中推断，由于大战在经济和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使社会不满情绪在纯粹政治上反英民族主义运动的表面下不断增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理论，从远处考查印度情况，他发现农村阶级斗争普遍展开，这是由于大战期间农村遭受到的经济剥削加强了。罗易进一步推测，当复员的士兵带着他们在国外战场上的经验回到他们的村庄之后，政治觉悟的主观革命因素必将增强革命发展中的客观条件。被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信仰所揭示的印度革命发展进程的前景，在两年以后出版的《过渡中的印度》一书中作了描绘。(40)

罗易到莫斯科的途中，在柏林做了暂短的逗留。在这里他会见了杰出的德国共产党人，如H·布兰德勒和A·塔尔海默（他们经常邀他去参加共产主义的领导人讨论现实革命问题的秘密会议(41)）。他们所有人都以友谊、亲善、尊敬的感情款待罗易。而且塔尔海默尽力为他用英语翻译会议发言，德国领导人的这一态度使他在共产党领导人中获得了地位。(42)

虽然他与五年前离开印度的使命并无关系，但他到柏林后，仍希望同印度共产党委员会建立联系。然而不久，罗易“发现柏林委员会并不是融洽的一伙”(43)。他觉得B·杜达（柏林8月革命委员会当时的成员）可以说是，“象一个大睡方酣的里普·范·温克尔”*(44)。而且当杜达要他算算他从各地的德国政府代理人手里领受的大量金钱时，使罗易为了难。因此，在柏林，罗易和柏林委员会之间没有能发展令人振奋的关系。

最后，当罗易到达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在列宁的主持下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罗易首次会见了列宁(45)。

在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主共运动制定理论策略指导路线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20年7月10日—8月7日），罗易虽然不是印度代表而是墨西哥代表，但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46)。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斗争特点的问题和为推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战略问题。那些国家（那里的人民正在由于对现存制度不满而慢慢沸腾起来）所实行的革命应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呢？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一种“社会革命”，或者是二个革命紧密相接的革命，如俄国那样？殖民地反帝斗争的理论方针应是什么？是支持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还是同时鼓励进行反帝、反本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反抗和斗争？

关于这些重要问题，在代表大会之前提出两个对立的提纲（一是列宁的，一是罗易的）的时候，就发生了尖锐的争论(47)。全部争论围绕着社会主义者是否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事实上，关于这些问题，正如罗易所指出的，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一直存在着争论(48)。社会党人方面的反对意见是，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得到工人阶级的同情，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任何支持不仅使工人阶级失去社会革命的利益，而且还有可能把它们“交给反动民族资产阶级任其随意摆布”(49)。

* 里普·范·温克尔，是美国作家欧文所写小说中的主人公，曾沉睡二十年之久，喻作时代的落伍者——译者

列宁指出，原先马克思主义中没有预见到的这种新的反革命的社会因素是殖民主义扩张的结果，因此，即使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殖民地人民的不成功的起义，也是为在附属国推翻资本主义创造条件。所以，国际无产阶级的战士应当把积极支持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进去。这一观点在列宁著名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作了阐述。据罗易说，在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这一提纲时，列宁宣布，“社会党人的第二国际”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因为它把被压迫的亚非大众排斥在外了。由于把促进非欧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包括在了它的纲领之中，第三国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组织——世界革命的参谋部(50)。

尽管罗易看出列宁的论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他“对于这个在理论上似乎有道理的纲领，如何实践，放心不下。”用他自己的话说：“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将得到怎样的支持呢？这是一个方法问题。第二国际的决议未必是不真实的。但没有实施的办法。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则完全不同。它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大国统治者。因而，它的决议有着强有力的支持。它们能够被实施。列宁说，俄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至少使一个国家的资源可供推动世界革命之用。他曾一度宣称，由于俄国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之前取得政权，它也就赢得了为世界被压迫大众解放牺牲自己的特殊荣幸。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可以得到帮助，而且深信，他们能献身于社会革命事业。但是，在殖民地国家中，却没有类似的革命工具。那么，共产国际又怎样能够发展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呢？”(51)据罗易说，列宁的观点是建筑在对各殖民地国家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并不了解的基础上的。(52)说明他是站在“旧的教条主义理论阵地上”(53)。列宁主张，帝国主义应对殖民地国家的封建社会状态负责，这种封建关系不仅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也阻碍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他提出，从历史上说，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由于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是由历史所决定，所以殖民地国家在他们进入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之前，必须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共产主义必须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力量，并在它的领导下，帮助解放运动(54)。为答复这一“正统的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罗易认为，民族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动的，因为即使在最先进的殖民地国家中，例如印度，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同封建的社会阶级并没有区别。因此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并不一定就意味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罗易反驳了列宁关于群众运动的鼓动者和领袖甘地是革命者的论点。他认为，作为一个宗教和文化的复活主义者来说，他在社会方面必然是个反动派，不管他在政治方面有多么革命。(55)

罗易反驳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运动“仍处在幼年状态”、所有共产主义者必需援助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观点。罗易进一步指出，殖民地国家存在“两种不同的运动”：一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实现政治独立纲领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另一种是贫穷无知的工农为争取从一切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群众运动。罗易认为，殖民地解放运动的真正力量决不应局限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狭小范围之内。他指出，殖民地大多数国家已经存在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共产国际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关系，应当通过这些政党实现，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在各国的先锋队。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同

这些无产阶级政党共同工作，而且通过他们给整个革命运动以一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罗易当时断言，殖民地的革命在最初阶段不是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如果共产主义先锋队一开始就掌握了领导权，革命群众就不会被引入歧途(56)。当时一家俄国报纸概括了罗易提出的纲领路线：“罗易同志得出结论说，必须从民族问题提纲第十节中(57)删去共产党必须帮助东方各国的一切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这段文字。共产国际应特别帮助组织和发展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而印度共产党只能完全致力于组织广大群众为其阶级利益而斗争”(58)。

据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说，罗易尚是一位运用革命战略的新手，之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继承人列宁的思想，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罗易可能觉得，他作为一位亚洲人比非亚洲人，即使是列宁那样的重要人物，更有资格了解亚洲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他不能不发表意见，否则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59)

第二，他的观点基本上是按照他对印度形势的估量中提出的。尽管环境把他吸引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但在本质上他们仍然是一位对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抱有极端主义看法的印度人。他始终反对印度国大党的温和政策，他憎恶信凭国大党比其他任何印度组织都富于革命潜力的政策。

第三，罗易知道，假如共产国际决定支持国大党领导下的争取印度自由的斗争，那么，同国大党有一定联系的V·札多巴塔雅就得合乎逻辑地选择控制共产国际关于印度的政策。罗易显然不喜欢这一意见。(60)

不论出于何种考虑促使罗易提出一份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供选择的提纲。他对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决议经列宁修改的措辞感到满意。在大会作了重要的补充修改后，重要的段落表达如下：“在那些落后的、主要是封建关系、宗教关系或宗教土地制度占优势的国家 and 民族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切共产党必须积极支持革命解放运动；支持的方式应由共产党——只要有的话——取决于现有条件研究决定”(61)。“革命的解放运动”字样取代了原来列宁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这一修改在取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殖民地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路线的基础上才有意义。这条路线包括以下内容：

1. 只要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共产国际就应该支持在反帝斗争中的“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

2. 即使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具有革命性质，也不应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

3. 作为“革命解放运动”的先锋队共产党已经建立，他们独立进行斗争的趋势不断增长。

4. 为了在殖民地成功地进行革命运动，工人阶级必须联合所有农民群众。

5. 为了从工人运动的群众中清除改良主义分子，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参加保守的工会。(62)

罗易作为革命战略方面能干的辩论家和天才的分析家，由于迫使列宁对他所赞助的观点作出让步，无疑取得了相当的威望。因此，他很顺利地赢得了共产国际的相当重要地位。当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选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立一个以“小型政治局”

著称的五人委员会时，罗易当选为这一“全权”组织——“共产国际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的成员(63)。二次代表大会后不久，政治局通过了两项决议：(1)在巴库举行第一次东方被压迫人民代表大会。(2)在塔什干建立共产国际中亚局(64)，中亚局三个成员是罗易、索科尔尼科夫和沙法罗夫(65)。

虽然罗易反对在巴库举行代表大会的主张，因为它没有意义，但他感到，作为反帝群众示威的一种象征性姿态，“计划的这场表演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他决定不参加“那走向神秘的东方大门的壮观的特别行列”。他渴望的是更重要的工作，即加强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地位。因此，他更重视设立共产国际中亚局的决议，负责在土耳其斯坦和布哈推动革命，然后把它扩大到临近国家，特别是印度。由于这一些想法，他坚决反对巴库代表大会的计划，他把它描绘为毫无意义的宣传鼓动，姿意浪费时间、精力和物力，甚至把它叫作“季诺维也夫马戏团”。(66)

1920年9月1日至20日，东方人民代表大会，在巴库一座纪念碑前举行，“纪念碑是为纪念在帝国主义暴行下牺牲的烈士而建立起来的”(67)。除了季诺维也夫、贝拉·库恩和拉提克的高傲的颂词和威胁性的讲话以外，代表大会的唯一工作是建立东方人民宣传和行动委员会，它由代表着二十个国家的四十七名成员组成，它的报纸叫《东方人民》。但委员会和报纸注定是短命的。(68)

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兴高采烈的日子过后，一段松弛时期开始了。罗易于1920年10月急着去到塔什干，建立了训练印度人的军事学校，而且建立了“印度之家”。罗易计划不单单“以军用物资供给边区部落，使他们能够给英属印度政府制造麻烦”，而且还计划在阿富汗“招募、装备和训练”一支军队。那里有来自印度的穆斯林香客，它们集中起来希望参加土耳其穆斯塔发·基马尔军队或者万一失败时在穆斯林统治的国家中居住下来。罗易希望借助这些香客，能够建立一支解放军并把边境土地作为作战的基地，而且借用雇佣的部族人的支持，进到印度境内并占领一些土地，然后应尽可能在那里建立文明政府。(69)根据罗易的计划，“革命政府的第一个宣言将提出一个在民族独立后立即实行社会改革纲领。要号召人民在敌后起义，以便使解放军能够一步步深入到国内去。特别应对产业和运输工人发出号召。解放区的全体成年人都要武装起来，有的从事保卫工作，有的用来扩大解放军。成立革命政府之时发布的宣言里所提出的社会改革纲领必能在解放区付诸实现，因此，广大群众必将热烈拥护新政权。自由的具体的美景将对大多数人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使他们受到鼓舞并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全国各地的既得利益者可能反对民族解放的革命涵意；但是帝国主义的势力被世界大战削弱了，被人民的起义动摇了。它们能保护那些企图阻止民族民主革命激流的少数上层阶级。”(70)

于是，罗易带了两车厢武器，一些金钱和印度货币，带领一批印度人、波斯人和中东人（他们组成了他所说的红军第一国际旅），离开莫斯科前往塔什干。(71)

(二)

1920年4月18日，哈里发会议在德里举行，这表明印度的穆斯林因为英国对土耳其（穆斯林哈里发的所在地）的背信而引起愤怒。会议决定不能再容忍英国的残暴，印度

穆斯林除了离开国土并实行希兹拉特(Hizrat)外别无他途。由于这一决议,一万八千名香客参加了希兹拉特,离开印度前往阿富汗。(72)

香客们经过的路程是曲折的。他们通过兴都库什山后到达蒂尔美兹(在现在的乌兹克斯坦)。当他们由此乘船渡过阿姆·达雅尔河时,他们受到土库曼暴动集团的攻击,这些集团从英国哪里接受了金钱和武器。但是由于红军的及时到达,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对于他们虽然是穆斯林但却遭到穆斯林土库曼的攻击这一事实有着强烈的反响,因而他们拿起武器同红军一起保卫吉尔吉要塞,同反革命进行战斗。(73)

R·艾哈迈德回忆道:“当时我们离开了吉尔吉。来了一艘载有武器的护送队的轮船,我们全体六十人搭了船。轮船把我们带到查尔札欧(Charjao)。红军战士在轮船的码头上奏乐欢迎我们。我们在查尔札欧住了三天并受到最殷切的款待。正是在这里我们彼此才得以很好地了解。直到那时,我们才不再相信其他人的意见。查尔札欧是通往各方面的铁路枢纽。我们集团中大约一半表示希望去安纳托利亚,苏联当局作了适当的安排。我们其余的人则乘火车到塔什干”(74)

1920年9月,他们到达塔什干不久,(75)罗易、伊夫林、A·穆克赫尔吉和他的俄国夫人罗沙,以及默哈迈德·沙菲赫就来看他们了。(76)而且由于他们的劝说,香客们立即开始在新建的塔什干印度军事学校学习。但是,当该学校由于苏英协议(77)于1921年5月关闭时,他们就前往莫斯科并进入了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该大学在1921年4月建立,目的是对亚洲人民进行马列主义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香客们的政治觉悟不高。正如罗易所指出的,他们多数是被宗教狂热发动起来的无知的大众。只有少数受教育的年青人,也就是构成哈里发运动主力的那些人,是有政治动机的。(78)当罗易在塔什干会见他们时,他发现他们是“一伙性情倔强的人,只受宗教狂热支配,这股狂热劲已被他们自己的经历打消了”(79)。据罗易说,尽管他们是反英的,但“他们多数甚至连民族主义者都不是”,而且“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民族是什么”(80)。罗易同少数受教育的集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且对他们说,“在训练印度革命战士的军事学校成立之前,应接受一个时期的政治训练”。罗易感到,在他们要想在移民者中间做些有效的工作之前,必须将那些狂热的群众和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区别开来。因此,他们决定自己去进行从政治上教育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的工作(81)。

R·艾哈迈德也承认,香客中间的多数受是宗教热情支配的,仅有少数人对于他们能从国外发现击败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一些方法抱有希望。(82)但是,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则不同意罗易的下述观点:香客在政治上是无知的。据艾哈迈德说,这是“一种不足取的看法”。他认为,印度在1917—1920年间发生的令人愤慨的事件,如加利安瓦拉大屠杀、旁遮普严禁令的恐怖、全国广大工人阶级的罢工,必然在青年香客的头脑中产生一定影响。他进一步认为,当不合作运动超出哈里发范围出现时,不能相信罗易所碰到的多数香客对资产阶级民主没有一丁点表示。(83)

R·艾哈迈德说,无论如何,香客们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一段期间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信仰,而且于1921年建立了印度共产党。艾哈迈德强调:“事实上,约在1920年末在塔什干就已建立了印度共产党,虽然我们一些人没有加入。尽管我们不在国内,但我们当时建立了党;我们感到我们所做的是必要的”(84)。R·艾哈迈德

继续说，在莫斯科建立侨民共产党以后，便加入了共产国际。默哈迈德·沙菲赫是党的第一书记，M·N·罗易、沙菲赫，阿巴尼·穆克赫尔吉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R·艾哈迈德指出：“罗易在莫斯科能够代表印度，只是因为这一侨民共产党的建立。否则，他只能以个人领导者资格继续呆在共产国际里面，但不是作为印度的特别代表”（85）。

R·艾哈迈德对国外建立共产党的解释没有被D·N·德拉赫（David·N·Druhe）完全确认。据德拉赫说，印度共产党是在塔什干的学生中建立的，它建立于1921年初（86）。然而，R·艾哈迈德非强调，印度共产党建立于1920年10月或11月在塔什干。穆札法尔·艾哈迈德认为，“强调1920年10月或11月建党是有意义的”，尽管R·艾哈迈德的解释不了解第一批党员的特征。罗易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言辞可以把它作为临时日期。因此，接受R·艾哈迈德的说法不是不公平的。1920年10月或11月在塔什干第一次建立共产党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87）这个侨民印度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1921年上半年，因此穆札法尔·艾哈迈德断定，“党的成立日期，如果不在1920年，那就不可能比1921年更晚”（88）。

无论如何，在塔什干建立了印度共产党并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了九个月以后，香客们渴望回国，他们感到他们的工作地点应该在国内。虽然他们回国的道路是很艰难的，但他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回到印度去。而且正如R·艾哈迈德所指出的，他们想出仅仅有一条难得的道路——帕米尔之路。苏联共产党对他们的旅程作了全面安排，R·艾哈迈德把这一旅程作为他们生活中最痛苦的经历来描绘的（89）。

但是，新的变革者印度共产党人回国的旅程以失败告终。当经过奇特库尔（现在印度境内）时，他们遭到警察逮捕并被带到白沙瓦审问，以后就成了著名的白沙瓦阴谋案件（1922年—1923年）。在这一事件中，被告根据印度刑法一二一条甲款被审问，该款规定“犯有图谋推翻英皇陛下统治印度特权的罪行”（90），在司法庭上，被告自己没有答辩。他们只是雇佣了一名律师去保证司法和政府不违反任何法律条款。

1923年5月，被审判的第二周，两名被告，G·默哈迈德和F·A·札喜德被释放，M·M·阿克巴和G·R·可汗被判处两年监禁，其余的服一年苦役。由于被告没有提出上诉，印度第一次共产党阴谋案就结束了。

为了建立一个在印度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的机关，罗易于1921年初被召到莫斯科去参加了一次印度革命者的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还有柏林集团的成员和这个集团的“动力”阿格纳丝·史沫特莱。由于他们到达莫斯科，罗易和柏林集团之间发生了争夺印度共产主义领导权的激烈斗争。但是，罗易取胜，柏林代表团大部分成员厌恶地离开了莫斯科。柏林革命者一离开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于1921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特别强调要在没有本国共产党的国家建立党。罗易自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便着手同印度国内外的印度革命者建立联系。

（三）

在印度，建立印度共产党的运动已在进行中，其结果是一大批未定型的小组在全国各个不同地区开展了活动。这些小组，如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所指出的，从政党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来说，更多的是宣传团体，而不是政党。共产主义

在印度还处于观念的范畴，而这些小组则是从战后群众炽烈的不满中吸取营养的。(91)

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最有活动能力的是在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拉合尔和康普尔。孟买小组的领导人是S·A·丹吉。他在学生时代就以激进的政治工作者而闻名。在富有的孟买面粉厂厂主劳特瑞拉的资助下，以及受了罗易的鼓励，他在孟买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并发表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短文(92)。丹吉进行政治鼓动的最初经验是1915年成功地组织学生罢课，以反对他所在大学的校长。此后，他参加甘地领导下的不合作运动。他在脱离了甘地主义之后，就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在1919—1920年期间参加了工人运动。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受到M·N·罗易和R·P·杜德的著作的影响。(93)1922年8月，他成为名为《社会主义》的英文周刊的编辑。这的确是丹吉的一个极为大胆的作为，如穆扎法尔·艾哈迈德指出的，印度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份杂志是以“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出版的。(94)

在加尔各答，穆扎法尔·艾哈迈德是“既无钱又无任何谋生手段”(95)，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极为表面”，但他是孟加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的指导力量。按他自己的说法，当他一跃而“进入未知世界”时，他依靠两件事——对人民的信任和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绝对忠诚。(96)

1920年，在艾哈迈德成为孟加拉作家协会一名脱产的工作人员的时候，他结识了卡西·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纳兹鲁尔当时是孟加拉第49联队的一个军曹，后来成为受人崇拜的一位著名诗人。纳兹鲁尔虽然参与制定了当时在加尔各答建立共产党的计划，但他并未加入党，因为他担心自己将不能坚守党的纪律。(97)在这期间，当时以左派领导人而知名的法兹卢尔·胡格决定创办一份孟加拉晚报《新世纪》，在纳兹鲁尔和艾哈迈德合编之下出版。在纳兹鲁尔有力的笔下，这份报纸从它出版的第一天起就极为流行。纳兹鲁尔不仅是个造反者——他成了孟加拉青年一代的中心人物，是把造反的信息不自觉地发表出来并激起人民潜伏着的愤怒精神的缩影。他已经成为强烈抗议各式各样的压迫、剥削和社会奴役的象征。他出现在青年的头脑最易接受事物的时刻。按艾哈迈德说，《新世纪》和其他的孟加拉日报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消息几乎都是关于工人、农民以及往返于孟加拉江河航线在轮船上工作的水手的。但是，当时艾哈迈德未能料想到，通过这份报纸上的这些作品，他正缓慢地被引向第三国际。(98)1922年，艾哈迈德结识了阿卜杜尔·拉萨克、阿卜杜尔·哈里姆和克图布丁·艾哈迈德。克图布丁·艾哈迈德同著名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穆拉纳·阿布尔·卡赖姆·阿扎德合作，办了两种乌尔都文周刊——《新月》和《知识》。那时艾哈迈德注意到，要在加尔各答弄到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是极为困难的，即使有些能弄到，共产党人也没办法买到它。正是克图布丁·艾哈迈德经常买来许多这种文献，也正是由于他，大家才有机会读到菲利普斯·普莱斯的《俄国革命回忆录》，这是在印度能弄到的第一本关于俄国革命的书。(99)

在马德拉斯，围绕着马来普鲁姆·辛加腊威鲁·切蒂亚组织了一个小的共产主义小组。切蒂亚是个老律师，后来在1922年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参加了工人运动并招致逮捕。他在印度国大党加雅会议(1922年)上提出了关于民族独立的决议。他还自称是以“同志们”的称呼早在1923年就向A·L·C·C·讲话的第一个人。(100)

在拉合尔，组织工作由在白沙瓦的伊斯兰学院经济学讲师古兰姆·侯赛因进行。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学生从拉合尔逃离印度，准备投身于革命工作，侯赛因放弃了他的工作到拉合尔来建立共产党。在拉合尔，侯赛因开始出版一份名为《革命》的乌尔都文月刊，当时他还是著名的西北铁路工人联合会的书记。(101)古兰姆·侯赛因是康普尔阴谋案（1924年）的被告之一，但在这一案件中，他成了一个告密者，所以，反对他的指控就被撤销了。

在康普尔和北方邦其它地方，除梭卡特·乌斯曼尼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之外，没有做出什么值得注意的工作。

（四）

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战略的起码的理解，从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两方面引导这些广泛分散的印度共产主义者直接同共产国际联系起来，这对罗易和其它在国外的共产党人来说，决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发展和改善同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的适用通讯渠道问题，确实令人非常苦恼。尽管困难很多，罗易还是极为刻苦地继续保持着与印度国内同志们的接触。据印度政府情报局的报告，罗易同国内共产党人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是与人的运动、金钱和文献有关的，并证明了是准确的、不令人失望的情报来源。(102)实际上，有关国内和国外共产党人之间的联系，情报局所不了解的事情是很少的。

除了严格的政治警惕性以外，对罗易来说，另一个问题是发现在国内合适的人，并通过这些人使他能以安全地通讯。遗憾的是，除了丹吉和艾哈迈德之外，他没能在国内找到几个真正的朋友。夏尔玛是一个本地治里（注：印度东南部的法国领地）的居民。罗易试图通过他发送信件，结果证明他完全不适于从事这项细致的工作。夏尔玛在罗易和印度共产党人之间作为联络人而开始工作之前，曾企图为情报局服务，但未被情报局雇用。用情报局官员的话说，“他生来就不能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103)他为罗易工作以后，警方确信夏尔玛“肯定会相当廉价地出卖罗易”。虽然罗易与辛加腊威鲁·切蒂亚还算幸运，但夏尔玛同罗易之间的秘密安排仅持续到1923年8月就终止了。(104)

尽管联系困难，但在这一期间还是进行了一些尝试，以便把这些处于矛盾状态的共产主义小组结合到明确表达政见的运动中去，并形成全国性的组织。1921年，根据罗易的提议，打算以“组织印度工人阶级政党的目的”为题，由沙姆苏丁·赫桑和古拉姆·侯赛因主持，在拉合尔召开印度工人阶级代表会议，(105)然而这次会议由于组织不当未能举行。但是，罗易继续要求共产主义者在工人现实所受痛苦的基础上去组织工人阶级，为了工人现实的要求，领导他们通过一系列罢工和宣传而形成革命的党，这样就使工人意识到阶级的团结。(106)

根据罗易只有组织共产主义先锋队才能在印度造成一场革命的鼓动宣传，1923年2月，辛加腊威鲁发表了一项宣言，号召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在全印会议上聚会。这项宣言的抄本发送给了几乎所有著名的印度共产主义者，包括罗易、丹吉、古拉姆·侯赛因、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和一个叫曼尼·拉奥·沙的博士。沙一收到宣言，在阿巴尼·穆克赫尔吉的默许下，就对宣言进行了若干修改，并把它做为自己的东西重新发表。侯赛

因接到这份修改过的宣言文本后，立即予以响应，于1923年6月30日在勒克瑙召开会议，组织他所谓的“曼尼·拉奥博士宣言党”。(107)沙的这种对抗活动使辛加腊威鲁大发雷霆，并立即向侯赛因提出抗议，指出他们所谓的曼尼·拉奥博士宣言“原本是我们草拟的宣言”。在欧洲的罗易收到曼尼·拉奥的宣言后，立即察觉到阿巴尼·穆克赫尔吉插手了此事，并不失时机地把宣言作为“假造的”文件进行了谴责。罗易还写信给丹吉，要他赶快与辛加腊威鲁取得联系，并告诉丹吉，这是因为辛加腊威鲁是一个“合法政党挂名领袖最好的人选”。(108)为了清除曼尼·拉奥对抗宣言所引起的混乱，罗易还于6月5日向国内共产主义者发出一项备忘录，提出全印会议的目的应该是组织两个党：“一个群众性的党称为工农党和一个非法的共产党”。罗易进而提出，共产党应是合法工农党的“非法的地下活动组织”，根据这一事实，共产党员应是工农党党员。他还提议，鉴于共产党还未被承认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工农党应该向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团。罗易接着指出，印度共产主义者应当放弃他们之间关于暴力还是非暴力的宣传论战，力求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结为“工作联盟”，“在反帝斗争中”利用他们自己的“每个机会来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施加压力，并使它的“革命意义”显示出来。罗易断言“这将是我们要制订的最好的策略活动，而不是把谎言加到我们的纲领上。”(109)

但是，不仅提议的会议未能举行，而且当政府对印度共产主义者领导实行镇压，诬告罗易、纳里米·古普塔、穆扎法尔·艾哈迈德、梭卡特·乌斯曼尼、丹吉、古拉姆·侯赛因、R·C·L·夏尔玛和辛加腊威鲁·切蒂亚等“以推翻英皇对英联邦印度的主权为目的，阴谋建立众所周知的共产国际革命组织全英联邦印度支部”(110)的时候，组织共产党的一切努力也遭到了极大的挫折。不过，1924年3月开始的著名的康普尔阴谋案只是对古普塔、乌斯曼尼、丹吉和艾赫迈德四个人提出了起诉。罗易当时在欧洲，不存在把他带上法庭的问题；夏尔玛在本地治里得到法国政府的安全保护而避开了起诉；侯赛因成了一个告密者；而辛加腊威鲁以体弱有病为借口获得了宽恕。

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丹吉供认他曾同罗易有过通信联系，但坚持其目的是为了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写作搜集资料。他还声明，他不同意罗易的纲领并在凭藉暴力手段达到政治目标的问题上与罗易意见不一。他要求有权宣讲社会主义，并争辩说，在帝国的其它部分包括大不列颠，是赋予共产党人以这种权利的。(111)其它被告否认对他们的一切指控并申明无罪。但是，反对他们的证据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法官，在曹里曹拉案件(112)中以判处172人死刑而声名狼藉的H·L·霍姆，判决了他们每人四年的严厉徒刑。当被告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时，上诉审判官一方面把所谓的阴谋说成是“荒谬的和难以置信的”；而另一方面又得出了被告是“在最严肃的精神中”行动的结论。所以，上诉被否决了。(113)

尽管康普尔阴谋案极大地削弱了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使共产主义者陷入混乱，但组织一个合法政党的努力仍在继续毫不减弱地进行。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某个人偶然地在听审席坐着，他名叫萨蒂亚巴克塔”。(114)这个案子一经了结，他立即“在报纸上宣布建立了印度共产党”，(115)于1924年9月1日在康普尔。他自己是这个党的书记。党员中有毛拉那·哈斯拉特·默哈尼(Maulana Hasrat Mohani)、V·H·纳西、拉玛·山达尔·阿伐斯特伊(Rama Shandar Avasthi)和潘迪特·拉姆·戈波尔

(Pandit Ram Gopal)(116)。最初阶段,这个党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到1924年12月,它宣称仅仅拥有78名少数党员,其中包括三位女士(117)。

正式宣布党的组成之后,沙蒂赫克塔传播了党的临时章程。章程宣布,党的名称为印度的共产党(Indian Communist Party),党的目标是确立完全自治并在公有制、控制生产资料以及“根据整个印度社会的利益”(118)分配财产的基础上改造印度社会。党的原则宣言指出,在印度社会中,有的人拥有生活资料,有的人被剥夺了一切,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宽的裂缝。当这种分裂不可避免地引起阶级对抗时,党的基本目标将是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工人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但沙蒂赫克塔明确表示,他的党主要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党,与共产国际无关。尽管有这种表示,政府对萨蒂亚巴克塔的活动还是有所怀疑,并三次抄了他在康普尔的党的办事机构。

在此期间,纳里米·古普塔和穆扎法尔·艾哈迈德从监狱里被释放了——后者是以健康不佳为由释放的。由于找不到什么值得可做的事,他们才决定参加与印度国大党年会同时召开的、定于1925年11月26日在康普尔举行的沙蒂赫克塔的印度共产党的会议。在到达坎普尔时,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发现象C·K·艾杨加尔、K·N·朱格勒卡尔(K·N·Juglekar)S·V·卡特、R·S·尼姆卡尔(R·S·Nimbkar)、J·P·贝尔圭尔霍达、阿尤德亚·普拉萨德和阿布杜尔·玛吉德等其它同志已经到了。

会议的接待委员会主席是毛拉那·哈斯拉特·默哈尼和尚未就职的主席辛加腊威鲁·切蒂亚。切蒂亚在康普尔案件中作为被告定罪后,出席了法庭,但政府没有进一步审理对他的上诉。(119)

会议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从一开始代表之间对新党的名称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萨蒂亚巴克塔坚决主张党“应该是印度式的,即一个民族主义的党,因此,应称为印度的共产党。”(120)默哈尼和辛加腊威鲁都同意这个观点。默哈尼说,“我们的组织是纯印度的,我们一般地同其它国家所有类似的党,特别是同第三国际的关系,将只是同情和思想上的共鸣。”(121)

辛加腊威鲁甚至更为坦率。当时他说:“印度共产主义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俄国人在他们国家所选择的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我们不是俄国人;印度可能不需要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我们是和世界共产主义一致的,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一致。”(122)穆扎法尔·艾哈迈德批判了这种态度并表明“根据共产国际的实践”,党的名称应是印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ndia)。最后,萨蒂亚巴克塔拿着文件和文件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

罗易在欧洲痛斥了萨蒂亚巴克塔、默哈尼和辛加腊威鲁的“非共产主义者”的态度,认为坚持和宣传上述那种观点的这些人“是印度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敌人”。(123)罗易指出,共产主义者要背叛他们的历史作用,“如果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国际性,一个民族共产党员就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敌人”。(124)罗易接着说:“一个共产党人不为本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去战斗,不领导反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反对隶属于共产国际,鼓吹无产阶级在百分之百地组织起来以前不应行动,没有任何有关战斗的劳工组织的思想,不相信革命,反对武装起义,急于同有产阶级讲公道,这样的共产党只能得到英国人的欣赏,而永远不会是印度工人阶级的党——为自由而斗争的先锋”。(125)

尽管在党的思想体系的方向上意见分歧是如此尖锐，由朱格勒卡尔、卡特、尼姆卡尔、艾哈买德、阿布杜尔·玛吉德、贝尔圭尔霍达和艾杨加尔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还是成立了，并在1926年年底公布了印度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卡特和贝尔圭尔霍达成为中央委员会的联合书记，艾哈买德、艾杨加尔被委任为他们所在地区的书记。(126) 贝尔圭尔霍达最后被发现是个警察密探并自动脱党。卡特当时成为总书记，他担任此职到1929年2月20日。(127)

新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1926—1929年期间就拟定组织印度共运的行动纲领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不过党还没有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因为，如穆扎法尔·艾哈买德指出的，“党是个小党”。然而共产国际对印度的党员一惯地极为关注。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各国代表会议上，印度共产党的两名党员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在1930年，党才正式地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128)

虽然中央委员会给印度共产党员提供了非常必须的、集中的和协调的领导，但它的正当的职能却继续受到拖延，因为，党员之间在思想、组织以及策略问题上完全缺乏一致。缺乏资金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妨碍系统地提出一项经过详细计划的行动纲领之主要因素是从国外开始灌进来的、过多的和相互冲突的指示。这是以罗易为一方和大不列颠共产党为另一方争夺领导权的症状。所有这些因素积累的结果，是在印度共产党的队伍中引起持续地争论和混乱。

罗易与大不列颠共产党领导之间的争执到1925年7月开始表面化。当时由殖民地局在阿姆斯特丹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大不列颠共产党的代表不赞同罗易的政策，并决定自己执行指导印度运动的任务。虽然期望争论的两个小组都能遵守共产国际的指导路线，但他们之间意见的不同是根本的、以致不能取得立即的妥协。这场争论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两本书——罗易的《印度政治的未来》和R·P·杜德的《现代印度》——中表现出来了。

在《印度政治的未来》一书中，罗易明确地把“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区别开来，并坚持认为前者是以要求和帝国主义势力结成联合阵线、保障国家安全和避免任何可能的革命为其特征的。因此，大资产阶级是民族解放斗争中要被消灭的阶级。也不可能指望中产阶级扮演革命的角色。用罗易的话说，中产阶级是一个“处在没有希望的、政治破产状态中”的阶级。所以，罗易论证，印度政治的未来将是由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社会力量决定的，而小资产阶级保持了并将永远保持着与帝国主义的对抗性，甚至“在帝国内部自治的较高理想”(129)这种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新时期，也是和帝国主义对抗的。罗易进一步论证，一个革命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将是由运动的社会特点决定的，而今后构成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组成部分是小知识分子、手工业工人、小商、农民和无产阶级。在印度社会现存条件下，这些组成部分属于被剥削的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将在他们与他们的剥削者之间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进行。(130)就策略而言，罗易提出，鉴于印度现存机构的反革命性质，所有反帝成分的紧急任务，是建立广泛得足以容纳一切民族革命力量的“人民党”。他说，无产阶级将加入这个党，但这个党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党中，无产阶级作为最先进的民主阶级，将肩并肩地和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站在一起。(131)

R·P·杜德在对印度形势的估计上大体上与罗易一致，但他在战略与策略问题上

跟罗易的看法不同。从战略观点来看，杜德打算承认民族解放斗争是社会各阶层——工人、农民、下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部分资产阶级——的斗争。(132)因此，从策略上来说，左翼民族主义成分“应该在一个大众的民族纲领周围聚集起来，并且在目前的运动和组织中为阐明(纲领)坚持斗争”。(133)所以，杜德坚决认为没有必要立即建立一个“人民党”。关于这一点，他劝告印度共产党人要等待，等待到“新的力量将不得不寻找他们自己的形式和表达方式”的时候。(134)至于新的力量如何兴起，是否通过现存国大党或自治党或由这些组织和其它成分结合的形式，那是“无关紧要的事”。(135)

注意到这一方面是有趣的，即，从1927年初，当杜德发现印度资产阶级是一股“反革命力量”时，他便转到了罗易的立场并承认只有在工农联合阵线基础上的群众运动才能给印度政治“带来新的生命”。(136)杜德还强调，印度资产阶级为了防止“继民族革命而来的”社会革命，已经“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他指出，“帝国主义则给予工业发展的引诱并允诺逐步地按宪法实行改革”。(137)

但是，在杜德接受罗易的理论之前，大不列颠共产党已开始派遣它的使者到印度来，企图夺取印度运动的领导权。第一个来的是波尔西·E·格拉丁。他于1925年1月30日到达，接触了几个共产党人之后，于4月10日离开印度，他回去仅仅报告说在印度没有共产党。继之而来的是大不列颠共产党党员、红色工会国际代表乔治·爱利逊。他在1926年4月30日到达孟买并忙于在工会会议内部组织一个左翼小组。但是，1927年1月23日，他以伪造护照入境罪被捕，并在服满十六个月的监禁徒刑后被驱逐出印度。

在这时，大不列颠共产党已经派了另一个代表菲利普·斯普拉特以伪装的图书出版商代理人的身份于1926年12月30日到达印度。按他自己的说法，他访问的目的是做一个使者和汇报人。(138)在赴印途中，他秘密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指示他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小册子，以推动印度效法国民党的榜样。(139)斯普拉特抵印后，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同印度共产党进行联系，并同他们一道组织一个为印度共产党作合法掩护的工农党。(140)他的另一个任务，正如在密拉特阴谋案中已经揭露的，是试图把共产党人安置在工农党的领导岗位，以便渗透到印度国民议会中去。(141)

1927年1月中旬，又来了两名使者——印度工人福利协会代表马尔迪·琼斯(Mar_ dy Jones)和英国议会下院共产党议员萨布尔季·萨格拉德瓦拉。虽然萨格拉德瓦拉访印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但他并不是受大不列颠共产党的委派而来的。据斯普拉特说，萨格拉德瓦拉的访问，可能和他与杜德兄弟争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有关(142)。从表面上看，萨格拉德瓦拉的访问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因为在他暂短的逗留期间，不仅能够培植同印度共产党的密切关系，而且为了他的事业唤起了公众极大的热情。不过他想使人们认为甘地主义是政治上的堕落和“一种道义上的瘟疫”的企图却失败了(143)。

在英国共产党人如此忙于促进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罗易却远离印度现场。因为，1927年初，他曾就一项任务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他不在欧洲，这就给大不列颠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以便放手干预印度事务和僭取运动的领导权。由于印度共产党处于从英国派来使者的影响之下，这就开始对罗易的职权进行非难。罗易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了。但是，不屈不挠的罗易并不因他的影响的减弱而气馁，而且在他焦虑于不失去与印度共产党的联系时，他就派了他最信任的同志之一法扎尔·伊拉希到印度去。

但是伊拉希除会见了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德里和孟买的少数几位共产党领导人以外,没有在印度取得什么成果。从他到达印度的第一天起,警察就对他的活动保持着严密的监视。1927年4月5日,根据印度刑事法典第121—A节,他被捕并被判处了五年徒刑(144)。

在这期间,另一个大不列颠共产党员、在印度最有成就的外国使者本杰明·F·布莱德雷到达印度现场。他以他兄弟的商号“起重机和地下涵管专利公司”工程师代表的身份为伪装(145),立即着手于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同斯普拉特一起,他指挥印度的共产党并开始以强有力的进展控制了印度共产党。

(五)

在印度共产主义的早期年代,M·N·罗易提出的并反复强调的观点之一是,印度共产党人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人民党。不论是一个人民党,一个群众党,一个共产党,一个民族革命党还是一个工农党都可以。要的是能作为团结所有革命成份的阵地。(146)在1924年10月22日致布尔格尔哈塔的信中,罗易表示了他的意见,即:在印度,共产党的当前任务“不是宣扬共产主义”,而是在群众行动和民族革命党的基础上组织民族的革命运动(147)。根据罗易的意见,人民党的极端重要性在于这一事实,即只有在这样一个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党的领导下,曾在巴多利被出卖了的民族运动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得到恢复”。(148)早在1922年11月7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会议上,(149)罗易就告诫说,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并不和旧的生产秩序作斗争”,(150)而肯定会出卖革命运动。“除非我们为从政治上训练客观上较为革命的其它社会成份作好准备,以代替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位置并担任领导,否则民族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从目前来看是成问题的。”(151)所以,印度迫切需要的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能表达和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利益和愿望的群众组织,用以反对仅仅代表本国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和政治扩张的那种民族主义”。罗易作出结论说,“我们必须在这些国家中发展党,以便去领导联合反帝阵线的组织工作”。(152)

虽然罗易对仅能用来为共产党做一种合法掩护的这样一个政党的效能有些疑虑,但他还是极为强调对工农党的需要。“通过工农党,共产党人能合法地活动,能合法地进行鼓动宣传,工人和农民能被组织起来保卫他们的阶级利益。”(153)此外,这样一个党将是一个最好的机构,通过它,共产党人能够和群众取得联系。

起初,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并不赞同罗易提出的关于工农党的意见,因为“从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来看,这种政党内在地就存在着危险”。但是,当这样的党一经出现,他们“不但不反对这种党的自动形成,而且在开始具体地形成时还进行鼓励”。(154)曼努里斯基极力主张共产党人参加到这些党的里面去,他告诉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会议说,共产党不应忽视这个“使东方革命化”的新现象。(155)菲利普·斯帕赖特在他给大不列颠共产党的信中也说,印度共产党应该创建做为一种合法掩护的工农党,而且其成员应该加入工会并取得工会的领导权。(156)

随着工农党在印度和其它殖民地国家中的发展,这就要求有策略上的指示。罗易在

1927年12月30日致印度共产党的信中提出了这种指示。这封著名的信后来被认为是议会信件,因为被截取的这封信的抄本曾被宣读并载入印度议会下院的档案。在这封信中,罗易明确提出了所规划的工农党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指导路线。(157)罗易在信中坚决主张共产党和工农党应同时活动——前者将是非法的而后者是合法的。他指出,只有当共产党避开参加进行反对英国的斗争,它才能在印度合法地存在,那就是,只有“牺牲共产党存在的理由”,才能有合法化。(158)另一方面,工农党将是一个合法的党,用以作为团结所有被剥削的社会成份的阵地——团结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罗易建议,“共产党人应加入到工农党中去,并且由于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的优点,将成为工农党的推动力量”。(159)

至于国际联系问题,罗易强调,一方面共产党毫无疑问地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工农党应与反帝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交往,这样将获得一切必需的援助,而不会被谴责为与莫斯科有联系。罗易还利用这个机会要印度共产党人提防大不列颠共产党在印度的活动。他指出,在柏林和巴黎的中心是共产国际照管印度事务的机构。印度共产党应该通过这些中心而不是通过伦敦去保持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因此,任何大不列颠共产党的代表只有在印度共产党的监督并与印度共产党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才可能到印度来并在印度工作。除非他受共产国际的委任,否则他就没有更高的权利。罗易进而说,在国外移民中的印度共产党人,既是印度共产党党员,也自动地成为工农党的党员。他们期望国内的同志们把他们看成是这两党的党员,而不应把他们看作是财政代理人那样的局外人。作为同一政党的成员,从本国和国际上都需要全体人员拧成一股力量(160)。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制定的政治路线,印度共产党员应该在印度国大党和自治党的左翼中工作,所有民族主义组织应该形成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161)1925年11月1日在孟加拉建立了印度第一个工农党。起初,这个党通称为印度国民议会的劳工自治党。按照穆扎法尔·艾哈迈德的看法,这个党既没有受过共产国际的鼓励,也没有受过M·N·罗易的鼓励。(162)据艾哈迈德说,劳工自治党的四个最早的创建人是:卡基·纳兹茹尔·伊斯拉姆、哥杜布丁·艾哈迈德、海曼塔·库玛尔·萨卡尔和沙姆苏丁·赫桑。(163)这个党的目标是,组织工人和乡村的农民,在议会内开展强有力的斗争,争取民族解放,并为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当罗易在欧洲获知这个群众组织建成的消息时,他向这个组织的创建人勇于“脱离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表示祝贺。(164)

在劳工自治党的倡议下,1926年4月6日在孟加拉的Krishnagar召开了一次农民代表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党的名称改为孟加拉农工党。起先建议这个新党应该称为孟加拉工农党,但按穆扎法尔·艾哈迈德的解释,“由于农民代表在会议中占大多数,所以,‘工人’这个字就不能放在党的名称的开头。”后来,在另一次代表会上,党的名称当然又改为工农党。(165)劳工自治党的一份孟加拉周刊《耕犁》,现在由穆扎法尔·艾哈迈德担任编辑。鉴于《耕犁》不代表所有的劳苦大众而仅仅象征农民,这份杂志的名称已改为《群言》。(166)尽管当时印度共产党不是非法的,但对共产党员来说,在公开的旗帜下进行工作还是困难的。所以,共产党就把它的纲领方便地放进工农党的纲领中来实

行，甚至工农党的宣言全都是由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起草的。(167)

1927年4月，当孟加拉工农党在阿土尔·钱德拉·古普塔主席主持下举行第二次年会的时候，它仅有40名党员，大多数局限在加尔各答地区，除了有一个支部是在迈门辛，称作Bangiya Krishak—O—Shramik Dal。但是到1928年3月在帕特帕拉举行第三次年会的时候，党大约有125名党员，并同一万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次会议仅有80人出席，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完全独立，立即设法解除群众对社会和经济的的不满。决议还号召工人和农民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孟买效法孟加拉的榜样，1927年2月，在S·S·密拉季卡的领导下，将现存议会的劳工小组改组为工农党，密拉季卡任新党的书记。1927年4月，这个党开始出版一份名为《革命》的周刊，编辑委员会由帕尔瓦提(Parwati)，乔格勒卡尔(Joglekar)、米拉卡尔、宁布卡尔(Nimbkar)和卡特组成。根据这个党的组织者所说，党的建立是迫于这样的事实，即，印度国大党受既得利益集团控制，这样的党不可能代表被剥削的工人和乡村的农民，所以，工人和农民应该团结在群众性党的旗帜下去照管他们自己的利益，并不断向国大党领导施加压力，使之实行和受苦群众合作。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创建一个工农党的时机成熟了，这个党能保证工农阶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在国民议会中支持他们的要求，帮助他们组织工会，并使他们从外国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168)党组成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并划分为几个小组，如工会小组、宣传小组、农民小组、青年小组等等，以便能使它的工作人员有效地贯注于他们各自的活动领域。但是，这个党的活动主要限于手工业工人之中和范围较小的农民之中。

同年，在阿布杜尔·玛吉德、索汗·辛格·左施、山托克·辛(Santokh Singh)和巴格·辛·克纳迪安(Bhag Singh Canadian)的倡议下，在旁遮普也建立了工农党。阿布杜尔·玛吉德是一个不疲倦的工会领导人。他和他的一些亲密的同事一起，在拉合尔铁路工人和纺织工人中间进行了很杰出的组织工作。他过去经常出版一份乌尔都文周刊，名为《工人》(Mihnataash)并且是著名的旁遮普的Naw Jawan Bharat Sabha的发起人之一。(169)索汗·辛格是一名卡德尔党党员，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接受训练之后来到印度，并创办了一份叫作《荣誉》的周刊。这份杂志用旁遮普文和乌尔都文两种文字出版，由索汗·辛格左施和菲罗兹·孟索尔(Firoz Monsoor)分别担任主编。1927年，在全印工会代表会议上，他们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发生了联系，其结果是建立了工农党，索汗·辛格·左施和阿布杜尔·玛吉德任党的书记和分别担任党的联合书记。1928年4月，这个新建的党举行了第一次年会，宣布党的目标是使国家摆脱英帝国主义的束缚，使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从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最终在印度建立联合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党和孟买工农党不同，它主要是限于在旁遮普的农民之中活动。

另一个工农党在密拉特的工农党会议上也建成了。这个会议是1928年10月在K·N·西哈戈尔(K·N·Sehagal)主席主持下召开的。出席这次会议的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中有穆扎法尔·艾哈迈德、菲利普·斯普拉特、阿布杜尔·玛吉德、索汗·辛格·左施和P·C·约西。(170)这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民族独立，废除土邦政权，承认工人建立工会的权利，废除柴明达尔土地制度，土地归无地的农民，建立农民银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和确定产业工人的最低限度工资。这个党出版了一份报纸《革命者》，1928年11月7日，该报以通栏大标题“我们是革命者！造反的旗帜在我们手中！”首次出版。（171）

既然在孟加拉、孟买、旁遮普和北方邦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工农党，1928年10月，印度共产党发出行动起来的号召，并决定于12月的最后一周在加尔各答召集所有工农党的全印会议，以便使这些党联合成为一个全印工农党（172）。这次会议由索汗·辛格·左施主持，有300多名共产党人和其它左派分子出席。会议决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由下列成员组成：穆扎法尔·艾哈迈德、D·戈斯瓦米、H·K·萨卡尔、K·N·乔格勒卡尔、R·S·宁布卡尔、S·A·丹吉、S·V·卡特、索汗·辛格·左施、巴格·辛·克那迪安、F·D·孟索尔、M·A·玛吉德、P·C·约西、L·N·卡达姆（L、N、Kadam）、吉利·山卡尔（Gouri Shan Kar）和B·N·穆克赫尔吉。（173）会议决定党将尽一切可能通过“澄清思想”来加强工农运动并精简组织机构。会议还强调了工人运动的国际特点，注重党同这样一些国际组织如反帝联盟、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和红色工会国际等进行联系的必要。至于同国大党的关系，会议决定党今后应当扮演一个“明确的独立的”角色，因为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基础上的一个群众运动不能与国大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领导取得一致。会议指出，只要工农党继续是相对的软弱并且在农村中没有组织起来，为了进行宣传鼓动，揭露反革命的领导并把革命派引向工农党的目的，党必须在国大党机构中执行传统的组织派别的政策，但工农党并没有控制或夺取国大党的意图。党员在国大党的职责纯粹是批评性的，他们将不被获准在国大党机构中任职，因为工农党的目的是要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组织，以便能尽快地免除在国大党内部从事宣传鼓动的必要性。（174）

从一开始，国际共产主义对印度出现的工农党的态度上是怀有几份戒心的。虽然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公开反对工农党的发展，但他们拒绝把工农党视为共产党的替代者。他们还担心过多地关注这些党可能会不可避免地推迟和妨碍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他们进一步认为这些党真正的性质暴露了劳苦群众一种双重的阶级特征，而这种特征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的先锋这一概念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管这些党看起来是如何革命，它们全都能很容易地转变为小资产阶级的组织。（175）更为有害的是，如佩季·阿诺特指出的，某些印度共产党人实际上把这些组织看作是“一种印度形式的”共产党，而没有“看到创建一个独立的共产党的必要”。（176）奥托·维海尔姆·库西宁在第六次各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也说，形成“劳工和农民”党以代替共产党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因为这些党倾向于把自己变为小资产阶级的党，以便脱离共产党，因而也就不能帮助共产党去联系群众。（177）

与库西宁的意见不同，克雷门斯·杜德告诉会议说，“用支言片语”取消工农党的作用将是一个错误。他指出，在印度发展的现阶段，工农党特有的重要作用在于他们正在打开一条重要通道，经过这条通道，共产党人才能找到走向群众之路（178）。索莫延德拉奈特·泰戈尔曾与孟加拉工农党有过积极的联系。他同意杜德的意见，并补充说，“在我看来，某些同志受了恶梦的惊吓，结果是他们自己荒谬地想象工农党是共产党的替代者。任何时候也没有人提出要以工农党取代共产党。农村中已经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有时比无产阶级本身更无产阶级。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必须在革命中挥发作用。小资产阶级分子反帝阵线的组织表现该是什么样？我们能把共产

党置于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沼泽中去吗？我们不能。另一方面，印度共产党应该利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干劲。我们认为这一点是明确的，即，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反帝阵线只能采取由城市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工农党的组织形式……过去，我们已经能够从改良主义的领导手中接办过一些工会，组织农民联盟，可是现在，我们却被命令取消这些工农党。这是列宁多次警告过我们的、十足学者气的教条主义”。（179）

在参加辩论的其它印度代表中，乌斯曼尼、拉扎（Raza）和玛祖特（Mazut）倾向于取消印度的工农党并责怪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这些党的态度优柔寡断。乌斯曼尼断言“工农党的存在是由于共产国际错误的策略和指示”（180）。拉扎补充说：“我们必须批判共产国际在经管工农党的组织的同时，全然忽视印度共产党的组织的错误。这就象把车放在马的前面一样愚蠢。这个政策必须修改”。（181）

印度工农党不顾对它存在的理由的这种激烈的争论，继续作为共产党的突出的一部分进行工作，直到它作为1929年密拉特阴谋案的后果而实际上被瓦解时为止。

密拉特阴谋案不仅未能从印度根除共产主义，而且使得共产党人成为殉教者并给了他们在印度政治生活中以独特的地位。由于利用人民的反英情绪，他们唤起了全国同情心，并取得象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法立德——乌尔——赫·安沙利（Farid—Ul—hug Aisari）和凯拉希纳思·凯特尤（Kailashnath Katju）这样著名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做他们的法律顾问。这次审判和美国的穆尼（Mooney）审判及沙柯——范扎提（Sacco—vanzetti）案件、法国的德累福斯（Dreyfus）案、德国的国会纵火案，都是属于同一类案件的最重要的实例。（182）随着这个审判，在印度，共产主义的第一章到了结尾，而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开始在印度建立起来”（183）。

奇怪的是，密拉特的历史性审判是与M·N·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同时发生的。1929年12月13日，《国际新闻通讯》用下面一段话正式宣布开除罗易：“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次全体会议决议（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九节）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29年12月19日的决定，依据布兰德勒组织的追随者不能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由于罗易向布兰德勒的刊物投稿，支持布兰德勒的组织，他已把自己置于共产国际的队伍之外，并应被认为是开除出共产国际。”（18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五条反对罗易的罪状：第一、指挥建立工农党而把印度共产党引入歧途；第二、命令印度共产党员到印度国大党内工作，因而使他们成为“掌握在妥协的和叛卖的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第三、提倡与共产国际政策相对抗的“非殖民化”理论；第四、出卖了中国的革命运动；最后，同反共产国际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Thalheimer）结伙，反对共产国际对德国的政策。（185）印度尼西亚代表穆索（Musso）在全体会议上说，“罗易不再是我们的同志，（186）确切地说，他是甘地的同志，要不然至少是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同志。”印度的代表中，G·K·A·卢哈尼和索·泰戈尔也谴责罗易的“无纪律，非同志式的行为，谎报和滥用资金”。泰戈尔写道，“这一点是明显的，即，把罗易开除出共产国际并不是由于他同斯大林主义有任何政治分歧。罗易，一个野心家，总是为有权势的人效劳。他一直是斯大林的最顺从的代理人，而且，他仍然是个希望命运的车轮能转动得对他有利，并由斯大林再次使他

能恢复以前的职位的斯大林主义者。只是由于被共产国际开除，他才参加了德国的布兰德勒反对派。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使他的开除涂上一层政治色彩。”（187）穆扎法尔·艾哈迈德也认为“罗易对领导权有某种渴望”，但“他没有能保持他那种地位的革命尊严，原因在于缺乏诚实。这，导致了他的垮台。”（188）

但是，这些罪状的编造者既不能证实他们反对罗易的论断，也不能在这一事态中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排除在外。从他们大放厥词反对罗易的方式来看，可以设想罗易沦为一个牺牲品，并非由于“渴望领导权”或“缺乏忠诚”，而是由于激烈的宗派斗争，这种宗派斗争早先曾承认的是托洛斯基。毕竟一个敢于同列宁交锋人，无论如何是不能被谴责为效劳于“有权势的人”。相反地，完全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妒忌这个孟加拉人罗易，因为他成功地取得了列宁的好感并在共产党的统治集团中担任了高级职务”。（189）

罗易自己对这一事件的描述使情况得到了证实。在题为《我的罪状》的文章中，他写道：“我站在‘神圣的断头台’的前面已有一些时候了。疯狂地运用这个‘神圣的断头台’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我站在那种位置上已经将近一年，没有为了保住脑袋害怕得战战兢兢，但却被篡夺了运动领导权的那些人的无能吓呆了，并对这种不胜任和不负责任的领导正在把运动引向破坏和毁灭的鲁莽感到惊愕”。罗易进而写道：“我没有犯下硬要归咎于我的那些罪行。我的过错是主张有独立思考的权利，而在共产国际眼前正在经历的危机时期，这种主张是不允许的。只要我不讲出我的不同的意见，我就不会被宣布为‘叛徒’和被放在官方国际的栅栏之外。沉默的口衔强加给了我，全部强有力的机构剥夺了我的一切表达的手段。换句话说，为了独立思考这一不可宽恕的罪行，如果我不能敢于讲出我的意见，我就可能不显眼地置于被人忘却的状态之中。但是，一个革命者的职责有的时候会越过专横纪律的狭隘界限……我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我发现参加反对派反对统治国际的现今的领导是我的革命职责”。（191）至于“印度问题”，罗易说，“我不同意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会议的全部决议，不仅是不同意有关印度问题的决议而已。如果错误只限于某一个特殊问题上，那不妨等待一下，希望这个错误终将得到纠正。但是在印度推行的错误路线，不过是一个重大错误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不允许保持沉默。共产国际已经处于危机之中，领导的组成情况和行动就表明了这一危机”（192）。此外，在罗易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没有能够乖乖顺从这一思想：正派、忠诚、公正在布尔什维克道德的条文中没有地位”。（193）

注 释

- （1） H·达雅尔：《四十四个Montbs在法国和土耳其》
伦敦，1920年，第68页
- （2） 对起义党活动的说明见R·辛格：《起义党的勇士们》
孟买，1945年
- （3） 见P·K·Mukhoradhyaya：《Bharate Jatiya
Andolan》（孟加拉文）加尔各答，1965年，第287—88页

- (4) 见琴·D·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孟买，1960年，第20页
- (5) M·普拉达普出生于1886年12月1日联合省阿利加尔一个有钱人家里，他在早年参加民族运动，1906年出席过加尔各答代表大会并且积极参加抵制英货运动。在1912年他成为Gokhale一个热心的追随者。1914年他以自愿流亡的方式离开印度并且通过马赛到达日内瓦。在日内瓦时，他和H·达雅尔、S·K·瓦尔姆和V·扎多巴塔雅取得联系，于1915年去到德意日。对于他的生活的详细叙述见M·普达达普：《我的四十年经历》，台拉登，1947年。
- (6) 见 G·T·布朗：《印度人的阴谋及美国的中立》
1914年—17年加利福尼亚，1941年，第40—52页。又见琼斯和P·M·霍勒斯戴斯：《在美国的德国特务机构》，波士顿，1918年，第264—67页
- (7) 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3—4页
- (8) 同上，第4页
- (9) 同上。G·D·巴里克写的序言第6页
- (10) 关于罗易的出生日期有争论，L·P·辛哈在他的《印度左翼联盟》一书（穆扎法普尔，1965年版）中说罗易在1887年出生（第69页）。据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说，他在1886年出生。但是他们承认不能肯定罗易的出生日期。
据罗易的一个表亲说罗易生于孟加拉历1292年（公元1886—87年）见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孟买，1960年，第20页，并见《激进的人道主义者》，加尔各答，XVIII，1954年2月7日，第78页。本文作者同意G·P·帕达扎腊在他的《M·N·罗易和激进的人道主义》一书中所说的年代。又见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562页
- (11) M·N·罗易：《狱中来信》，第204页
- (12) 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V·B·巴尔尼克写的跋，第562页。当时的一位革命者后来描述了罗易在革命民族主义所受洗礼时说：“纳伦德拉几乎还是一个孩子，不满十四岁，却精力充沛，满怀革命热情，他闯进一个小房间我们正在那漫谈当时我们在孟加拉及其他地方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同我们谈了一次话以后，就提出要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使印度摆脱外国桎梏的解放。他起誓说，他准备干最难办的事；因为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没有什么事不能办到。不久以后，他就同我们一起干起来了。后来事实证明，他对我们的运动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具有人类伟大领袖才有的稀有品质”参看A·K·Hincli，《M·N·罗易——向前看的人》，艾哈迈达巴德，1938年8页。
- (13) 见A·K·Hincli：《M·N·罗易——向前看的人》，艾哈迈达巴德，1938年，第20—21页
- (14) 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5页
- (15) 同上
- (16) 同上，第22页，又见凯：《共产主义在印度》，德里，1926年，第4页
- (17) M·N·罗易：同上书，第22页
- (18) 同上

- (19) 同上,第29页,罗易叙述了最后使他对马克思哲学感兴趣的一件小事。一天晚上,当拉杰帕特·雷正在向社会主义大会演讲的时候,一个人提问到:“民族主义者打算怎样结束印度广大群众的贫穷?”罗易记述了在会上发生的事情:“讲演人和提问题的人热烈地辩论起来。前者含糊其词地回答说,‘啊,让我们首先成为我们自己家里的主人。’对方不满意这个回答,演讲的人就变得很不耐烦,很激动了。质问的人逼问他的观点,甚至以挑战的态度问道:‘对于印度广大群众来说,被本国资本家剥削和被外国资本家剥削有什么差别呢?’拉杰帕特·雷勃然大怒,反驳说:‘一个人被他兄弟踢一脚和被外国强盗踢一脚那是完全不同的。’听众惊得鸦雀无声。起初我和拉杰帕特·雷一样,对那些流浪者(这是对美国劳工运动中的极左派的一种贬称)的厚颜无耻感到愤怒;但同时也感到于心不安;我们这方面有些论点是不对头啊。猛然之间,我的心上闪过一道光芒;这是一种新的光芒。”参看M·N·罗易:《回忆录》,28页
- (20) C·查克拉瓦蒂:《新印度》,加尔各答,1951年,34页。
在《回忆录》中,罗易否定查克拉瓦蒂博士为他乘“德意志号”到德国旅行所做的安排。相反地,他说他从纽约到德国的失败“是由于纽约领导人的滑头所致,”罗易说:“我无法能设想骗子在欺骗我,——但是他也知道他正在背叛他自以为代表的事业”。见M·N·罗易:《回忆录》,第67页。
- (21) 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23页。
- (22) 同上,第58页
- (23) 同上,第59页
- (24) 同上,第184页
- (25) 同上,第109页
- (26) 同上,第213页
- (27) 同上,第107页
- (28) 同上,第549页
- (29) 同上,第550—551页
- (30) M·N·罗易:《印度的现在、过去和将来》,莫斯科,1908年,第122页
- (31) 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194页
- (32) 同上,第195页
- (33) 同上,第195页
- (34) 同上,第204页
- (35) 同上,第205—206页
- (36) 同上,第211页
- (37) 同上,第223页
- (38) 同上,第219—220页
- (39) 同上,第237页
- (40) 同上,第237—238页
- (41) 同上,第277页

- (42) 同上,第277页
- (43) 同上,第294页
- (44) 同上,第293页
- (45) 有关罗易第一次和列宁会见的生动描绘,见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341—47页
- (46) 在罗易首次去爪哇的同时,由A·穆克赫尔吉组成的印度代表团已经派遣到日本,而且M·P·J·阿扎腊在1908年离开印度并为印度的自由斗争寻找支持而去欧洲和美国旅行。但是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印度人中,只有罗易因为是墨西哥代表团团长而享有表决权。伊夫林、穆克吉赫尔吉、阿扎腊只有发言权。在这里可以指出的是罗易仍然用墨西哥护照旅行,直到1925年。见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孟买,1960年,第27页。又《印度群众》,1925年2—3月,第2页。
- (47) 罗易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是在列宁的命令下,大胆起草的一个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可供选择的提纲。他回顾说:“我不愿意公开反对列宁。我们的讨论都是私下进行的。代表们窃窃私语,多半是怀着敬畏的心情,他们说,那个印度自命不凡的家伙胆敢怀疑列宁的智慧,并同这位论战大师交锋。但是,列宁的态度是异常和蔼和容忍的。起初,他对一个生手的天真似乎感到有趣。可是不久他就被我的种种论据打动了,而且不能辩驳我所引用的事实的可靠性。……最后,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列宁居然提议,在一个专为研究这个问题而设立的委员会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以后,他将提议把他的提纲和我的提纲一并提交代表大会以供采纳。于是我同意把我的批评见解和建议写成一个文件,但是我坚决主张那绝对不能作为一个供择选的提纲,而只能作为一个补充提纲提出来。列宁同意这样的意见,认为我们都正在探讨一个新主张,在没有实践经验以前不要忙于作出最后的判断。”见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380—81页
- (48) M·N·罗易:《回忆录》,孟买,第376页
- (49) 同上,第376页
- (50)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1920年以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期望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遍及全世界,认为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应当得到支持,并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1916,当向全俄东方各民族党组第二次代表大会致词的时候,列宁宣布:“东方各民族的革命运动在目前只有直接和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联合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他接着指出:“1905年以后,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相继发生了革命,印度也开展了革命运动。”列宁断定:“现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要把觉醒的东方各民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同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见列宁:《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1957年(未查到原文——译者)
- (51) 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378—79页
- (52) 同上,第376页
- (53) 同上,第376页

(54) 同上,第376页。1916年列宁写到:“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中最革命分子,帮助他们起义,如果必要的话,帮助他们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见《列宁全集》,22卷,莫斯科,1957年,第140页《未查到原文——译者》

(55) M·N·罗易:《回忆录》,1964年,第379页

(56)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0年,第578页

(57) 在列宁提纲初稿11节里写道:“在封建关系或宪法关系或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各点: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首先是落后的民族在殖民地关系或财政关系上依赖的那个国家的工人,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参见上书,第478页

(58) 苏联官方报导和解释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美国国务院出版局,华盛顿,第43页

(59) 关于这一点,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结识罗易的英国共产党人,J·J·麦尔菲,作了这样的描写:“他身材修长,头发乌黑,目光炯炯,是一个漂亮的婆罗门。……他是我所遇到过的印度人当中最傲慢的一个”。J·J·麦尔菲:《新天地》,第240页。

另外,印度共产党在这个时间知道罗易的人描述,“他在讨论问题,自高自大,卑气暴躁。他经常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阿卜杜耳·夸底尔·汗:《时代》(伦敦),1930年2月25日第16页。

罗易在《回忆录》中供认,“如果不是傲慢的话,我确实是很矜持的。在我初接触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时,这种态度是一种自卑情绪的表现。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又学会了容忍和谦虚。”

(60) 见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孟买,1960年,第30—31页。

(61)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20年,第574页

(62) 见L·P·辛哈:《印度左翼》穆扎德普尔,1965年,第37页

(63) 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390—91页

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说明了罗易被拒绝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情况:“第一种原因关系到英苏关系的微妙情况,这是由于英国指责俄国人干预印度引起的。不让罗易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可能就是为了不冒犯英国外交部”“另一种可能性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俄国人可能并不十分想过罗易来贯彻他们在印度的全部工作”。关于这一点有记载说,罗易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后补委员,在1924年成为有表决权的正式成员,同时还参加了主席团。见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孟买,1964年33页。

(64) 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391页

(65) 索科尼科夫,很年轻,也许不到四十岁,是中亚—土耳其斯坦前线红军司令员。他也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一个英俊的青年。“他有智

力,使他有资格担任地下党机关报《真理报》的主编,那正是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夕的关键时刻。……列宁逝世后,在党内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他支持了从前的上司托洛茨基。由于托洛茨基的垮台,他在政治上从此就默默无闻,终于被他们的嗜血的母亲即革命搞掉了”。

中亚局另外一个成员,萨法罗夫是“党内才子……是列宁一个非常优秀的年青门徒”。他赢得了“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作家和卓越的新闻记者”的荣誉。但是,罗易说他是一个狂热者,“他曾一度相信托洛茨基是一个反革命。然后他又深信斯大林正在叛变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是热烈的,诚恳的。他狂热地下决心要保全信仰的纯洁和捍卫教义的完整性,到头来却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萨法罗夫是1937年清党中未列名的牺牲者之一”。见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392—94页

(66) 同上,第392—92页

(67) 同上,第406页

(68) 见W·Z福斯特:《第三国际的历史 第二卷,德里,1956年,第30—31页。穆札法尔·艾哈迈德说明了巴库代表大会的结束的日期:“这一定比9月20日要早,因为从共产国际文件中了解到在9月20日季诺维也夫向巴库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作了报告”。参见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和它在国外成立的经过》,加尔各答,1962年,第64页。又见D·N·德鲁赫:《苏联和印度共产主义》,纽约,1959年,27—30页

(69) 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420页

(70) 同上

(71) 见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孟买,1960年,第35页

(72) “希兹拉特”(Higrat)意思是,为了使自己免受压迫而离开自己的祖国和朋友们,有关“希兹拉特”运动的完整解释参看(1)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和它在国外成立的经过》,第11—15页,加尔各答。(2)S·乌斯玛尼:《从色沙瓦到莫斯科》,贝那拉斯,1927年。(3)印度年鉴,1921年,第一部分,第206—110页。(4)L·H·Hetchinson:《密拉特的阴谋》,伦敦,1935年

(73) 穆札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1921—33年),加尔各答,1959年

(74) 穆扎德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和它在国外成立经过》,加尔各答,1962年,第27页。到塔什干的人有(1)M·A·F(小组的领导人),(2)M·A·玛季德,(3)S·迈哈迈德,(4)F·曼苏尔,(5)G·R·汗,(6)M·M·A·辛哈(7)A·K·塞拉伊(8)F·阿里,(9)G·迈哈迈德,(10)札德(11)A·萨法达尔,(12)A·马蒂(13)拉席,(14)S·乌斯玛尼,(15)塔朱蒂,(16)M·A·夏,(17)M·侯赛因,(18)A·库亚姆,(19)R·艾哈迈德以及其他,见同书,第27—28页

(75) 同上 28页

S·乌斯玛尼在《从白沙瓦到莫斯科》中说,当他们到达塔什干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两

派“职业革命者”，一派是罗易领导，包括阿巴尼·穆克赫吉和哈迈德阿里，另一派的首领是阿卜杜耳·腊勃，他们得到阿札腊和卡黎耳·贝(土耳其恩维尔帕夏的舅父)。据乌斯曼尼说，在那批香客中，有的人，包括乌斯曼尼在内，参加了罗易的一派，有的人参加了腊勃一派，其他人则形成一个“中立派”。见与乌斯曼尼：《从白沙瓦到莫斯科》，贝那拉斯，第1927年。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孟买，1960年，第35页

(77) 见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和它在国外成立的经过》，加尔各答，1962年，第30页

(78) 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420页

(79) 同上，第456页

(80) 同上，第461—462页

(81) 同上，第462页

(82) 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和它在国外成立的经过》，加尔各答，1962年，第16页

(83) 同上，第73—74页

(84) 同上，第33页

(85) 同上，第34页。R·艾哈迈德于1958年2月29日给穆扎法尔·艾哈迈德一封信中说，党的第一批成员有M·N·罗易及其夫人伊夫林，A·穆克赫吉及其夫人罗沙，M·沙菲赫和M·阿里，沙赫，同上书，第57页

(86) 达维德·N·德鲁赫：《苏联和印度共产主义》，纽约，1959年第34页

(87) 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和它在国外成立的经过》，加尔各答，1962年，第65页

(88) 同上书，第87—88页，该人记载说，R·艾哈迈德关于印度共产党成立的解释为伊夫林所确认。简·德格拉斯引用她所说的印度共产党在1920年10月建立的。见《共产国际文件》(1919—43)，伦敦，1956年，第2卷BⅡA，编辑按，第11页

(89) 关于他们从莫斯科到印度旅行的直接的描述见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和它在国外成立的经过》，加尔各答，1962年(R·艾哈迈德旅行的故事)第5—50页

(90) 白沙瓦阴谋案件中被告的有(1)N·A·沙赫，(2)G·R·汗(3)M·A·马季德(4)F·马索耳(5)H·A·哈希姆(6)R·艾哈迈德(7)S·默罕迈德(8)A·O·塞赫莱(9)F·札希德(10)G·迈哈迈德 被告1—9是侨居国外的印度共产党员。

G·墨哈迈德，被告的第十名已经老早就从塔尔干回来了，而且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他的名字是在事件发生后被加在被告的名单上的。政府的目的是使他成为一个同犯人。结果在共产党中，F·A·札希德成了同犯人。

(91) 见《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会议》，伦敦，1924，第11页。

(92) 见英都拉尔·雅尼克：《朗巧达斯·巴范·罗特法拉的生平》(Life of Ranchoddas Bbavan Lotvala)，孟买，1952，第45页。

(93) 见S·V·夏特：“回忆录”，《新世纪》，1958年，第4期。

- (94) 见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加尔各答,1958,第10页
- (95) 同上,第8页。
- (96) 同上。
- (97) 同上。
- (98) 同上,第6页。
- (99) 同上,第9页。
- (100) 菲利普·斯帕赖特:《炸开印度》(Blowing up India),加尔各答,1955,第83页。
- (101) 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加尔各答,1959,第10—11页。
- (102) 《印度的共产主义 1924—1927》(Communism in India 1924—1927),加尔各答,印度政府出版,1927,第127页。
- (103) 凯:《共产主义在印度》(Communism in India),德里,1926,第91页。
- (104) 同上,第103页。
- (105) 见A·K·赫因地(A·K·Hindi):《M·N·罗易——向前看的人》,阿迈达巴德,第101页。
- (106) 同上,第125页。
- (107) 凯:《共产主义在印度》,德里,1926,第79页。
- (108) 见《康普尔阴谋案证词》,证词之二十三,第9—11页。
- (109) 见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孟买,1960,第64页。
- (110) 见《康普尔阴谋案证词》,导言,第5页。有关对被告提出指控的细节,还可参见《印度年鉴》,加尔各答,1924,第1卷XV111页
- (111) 见《社会主义者》,孟买,1924,11,24。
- (112) 见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加尔各答,1959,第17页。
- (113) 见L·F·鲁虚布鲁克·威廉斯(L·F·Rushbrook Williams):《印度 1924—1925》,加尔各答,1925,第100页。
- (114) 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加尔各答,1959,第16页。
- (115) 同上,第17页。
- (116) 见《社会主义者》,孟买,1924,12,17,第7页。
- (117) 78人之中,来自北方邦50人,拉杰普塔纳11人,C·P·7人,孟加拉5人,比哈尔2人。这些成员中,16人是新闻工作者,11人是“国家工作人员”,少数是商人。“而在这个共产党内,工人阶级成分则是微不足道的”。见《社会主义者》,孟买,1924,12,17和L·P·辛哈:《印度左派》,穆扎法尔,1965,第155—156页。
- (118) 见V·H·乔西的论文,题为“印度共产党的章程和纲领”,《社会主义者》孟买,1924,11,19。
- (119) 本来塞普尔叶·沙克拉特范拉那时在伦敦被邀请主持这个会议,但因未获大不

- 列颠共产党允许，没能出席。见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加尔各答，1959，第18页。
- (120) 同上书，第19页。
- (121) 见《印度年鉴》，加尔各答，1925，第2卷，第367页。
- (122) 同上，第371页。
- (123) 见《印度群众》，巴黎，II，1926，3，第6页。
- (124) 同上，1926，9。
- (125) M·N·罗易：《什么是共产党？》，载《印度群众》，巴黎，1926，1。
- (126) 见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加尔各答，1959，第21页。同时参见《密拉特法庭审判录》，第343页。
- (127) 温德米勒：《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孟买，1960，第78页。
- (128) 见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加尔各答，1959，第28—36页。
- (129) M·N·罗易：《印度政治的未来》，伦敦，1926，第90页。
- (130) 同上，第95页。
- (131) 同上，第114页。
- (132) R·P·杜德：《现代印度》，伦敦，1927，第129页。
- (133) 同上，第148页。
- (134) 同上。
- (135) 同上。
- (136) 见《现代印度》英文版序言，伦敦，1926，12。
- (137) R·P·杜德：《现代印度》，伦敦，1927，第17页。
- (138) 菲利普·斯帕赖特：《炸开印度》，加尔各答，1955，第29页。
- (139) 见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孟买，1960，第87页。
- (140) 菲利普·斯普拉特：《炸开印度》，加尔各答，1955，第29页。
- (141) 见《密拉特法庭审判录》，第98页。
- (142) 菲利普·斯普拉特：《炸开印度》，加尔各答，1955，第36页。
- (143) 见沙普尔吉·沙克拉特范拉·《印度是不同的吗？》(Is India Different?) 伦敦，1927，第17页。
- (144) 见《印度的共产主义 1924—1927》，印度政府出版，加尔各答，第114页)
- (145) 见《密拉特法庭审判录》，第162页。
- (146) 《国际新闻通讯》，1929，2，18。
- (147) 《密拉特阴谋案》，第67页。
- (148)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会议》，伦敦，1924，第196页。
- (149) 给印度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会议的邀请已经发出，包括罗易、丹吉、纳里米·古普塔、奇拉·瑞加因·达斯 (Chira Ranjan Das) 【德虚班·德胡·C R·达斯 (Deshbandhu·C·R·Das) 的儿子】和苏布哈斯·钱德拉·布斯 (Subhas Chandra Bose)。但结果只有罗易出席会议并投了印度唯一的一

- 票。见凯：《共产主义在印度》，德里，1926，第27—28页。
- (150) M·N·罗易：《英帝国与革命》，载《拉合尔月刊》III，伦敦，1922，10，第224页。
- (151) 《前卫哨兵》，苏黎世，1923，1，15，第3页。
- (152) 同上。
- (153) 《密拉特阴谋案——官方文献》，第29页。
- (154) 见L·P·辛哈：《印度左派》，穆札法普尔，1965，第17页。
- (155)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会议》，伦敦，1924，第187页。
- (156) 菲利普·斯帕赖特：《炸开印度》，加尔各答，1955，第29页。
- (157) 见《密拉特法庭审判录》，第180—189页；伦敦《泰晤士报》，1928，11，25；《政治家》，加尔各答，1928，8，18。
- (158) 《密拉特法庭审判录》，第186页。
- (159) 同上，第187页。
- (160) 同上，第189页。
- (161) 见《国际新闻通讯》，V·1925，4，18，第513页。
- (162) 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和党在国外的形成》，加尔各答，1962，第153页。
- (163) 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加尔各答，1953，第8—9页、第22页。这里可以注意到，索姆廷德拉奈思·泰戈尔表明穆扎法尔·艾哈迈德也是劳工自治党的创建人之一。见泰戈尔：《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性发展》(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Movement in India)，加尔各答，1944，第6页。
- (164) M·N·罗易：《走上正确方向的一步》(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载《印度群众》，巴黎，1926，第3页。
- (165) 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加尔各答，1959，第23页。
- (166) 同上。
- (167) 同上，第24页。
- (168) 见《第四次和第六次各国代表会议期间的共产国际1924—1928》，伦敦，1928，第475页。
- (169) 见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1959，第24—25页。
- (170) 同上，第25页。
- (171) 《革命者》，1928，11，17
- (172) 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1959，第26页。
- (173) 在这个会议上，许多旗帜带有这样的口号，如：“我们什么都不要，就要完全独立”、“在耕种者之间划分土地”、“西蒙委员会见鬼去吧”、“打倒尼赫鲁的报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虚伪”、“打倒资本主义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等等。见L·P·辛哈：《印度左派》，穆札法普尔，

1965, 第188页。

- (174) 见《第一个全印工农党的提纲》，加尔各答，1928。
- (175)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会议关于殖民地问题提纲，载《国际新闻通讯》，1928, 10, 17
- (176) 达吉·阿尔诺特(Dage Arnot):《英国如何统治印度》(How Britain Rules India), 伦敦, 1929, 第31页。
- (177) O·V·库西宁:《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载《国际新闻通讯》VIII, 1928, 10, 4
- (178) 见《国际新闻通讯》，VIII, 1928, 10, 17。
- (179) 《国际新闻通讯》，VIII, 1928, 11, 8, 第1473页。
- (180) 同上。
- (181) 同上。
- (182) 哈罗德·拉斯基(Horold Laski):为赫特钱逊(Hutchinson)的《在密拉特的阴谋》一书写序言，伦敦，1935, 第8页。
- (183) 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形成的岁月》，第33页。
- (184) 《国际新闻通讯》，1929, 12, 13
- (185) 见《国际新闻通讯》，1931, 10, 29, 第996页，并参见大卫·N·德鲁伊(David N. Druhe):《苏俄与印度共产主义》(Soviet Russia and Indian Communism), 纽约, 1959, 第120页。
- (186) 《国际新闻通讯》，1929, 8, 21, 并参见奥佛斯特里特和温德米勒:《印度的共产主义》，孟买，1960, 第140页。
- (187) 索姆廷德拉奈斯·泰戈尔:《印度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发展》，加尔各答，1944, 第140页。
- (188) 穆扎法尔·艾哈迈德:《印度共产党和党在国外的形成》，加尔各答，1962, 第66页、第154页。
- (189) 见大卫·N·德鲁伊:《苏俄与印度共产主义》纽约, 1959, 第120页; 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 第581—584页; 并见《泰晤世报》(伦敦) 1930, 2, 25, 第15页。
- (190) M·N·罗易:《回忆录》，孟买，1964, 第583页。
- (191) 同上，第584页。
- (192) 同上，第584页。
- (193) 同上，第IX页。

峰君 杨淮译自:《印度左派运动(1917—1947)》(加尔各答，

1977年版)第三章:共产主义在印度